

从“自述其名”方式看“卒章显志”叙事模式的变迁

——以《崧高》《烝民》《巷伯》《节南山》《閟宫》为中心

邵炳军*

[摘要] 《诗·小雅·巷伯》《节南山》《大雅·崧高》《烝民》《鲁颂·閟宫》的“叙述者”皆采用在卒章“自述其名”方式“显志”的叙事结构模式,即在叙事文本中以“真实作者”替换了叙述者“我”,是一种最典型的“公开的叙述者”,其共同特点就是叙事主体显性评价与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由此而开创的在诗歌叙事文本中“卒章显志”的叙事模式,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个体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诗歌;真实作者;叙事文本;自述其名;卒章显志;叙事模式

所谓“自述其名”,就是真实作者(real author)在叙事文本的末尾直接点明自己的姓名,使叙述者“我”的真实身份明朗化;所谓“卒章显志”,即叙事主体(narrative subject)采用篇末点题方式为受述者(narratee)表达叙事动机与主旨的一种叙事结构模式。本文讨论的“卒章显志”,主要是指真实作者在卒章通过“自述其名”方式以“显志”的叙事结构模式。传世《诗经》中“真实作者”在叙事文本卒章中采用“自述其名”署名方式的有《小雅·节南山》、《巷伯》、《大雅·崧高》、《烝民》、《鲁颂·閟宫》5篇。故笔者拟以此为中心来观察西周后期至春秋中期(前821—前656)一百六十六年间叙事诗“卒章显志”结构模式的变迁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示先秦诗歌叙事本体的深层结构,凸显中国古代诗歌叙事传统的重要特色。

一、《崧高》、《烝民》卒章以“吉甫作诵”方式“显志”的叙事模式

《崧高》为周宣王七年(前821)王室卿士尹吉甫(兮甲吉甫、兮伯吉父)赠别宣王元舅申伯自西申

* 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4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春秋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考论”(14BZW038)阶段性成果。

(在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附近)陟封于南申谢邑(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东南之古谢城)之作^①。本诗凡八章,全以“赋”体展开叙事:首章写神生申伯以辅周,美申伯出身尊贵;次章写宣王命陟封申伯于谢;三章写营谢先正经界而后迁民;四章写谢有城郭宫室而后宣王赐遣;五章写宣王饯别申伯适谢,美宣王能建国以亲诸侯;六章写宣王祖饯委积之勤;七章写申伯归谢而民之喜来,颂宣王能亲诸侯而天下复平;卒章美申伯之德,述作诗送行之意。其中,卒章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此“吉甫作诵”,即自述其名;“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即自评其诗——诗意美大而曲调极好;“以赠申伯”,言其创作缘由。

《烝民》亦为周宣王七年(前821)尹吉甫赠别王室卿士樊侯仲山甫(樊仲山甫、樊仲甫、樊仲、樊穆仲)受王命赴齐筑城(齐都邑临淄)之作。本诗亦八章,皆以“赋”体展开叙事:首章写天生仲山甫以辅助天子,言人性本善;次章写天子使仲山甫颁布政令,美其有柔嘉之德;三章写王命仲山甫之职,美其能宣道王命;四章写仲山甫宣道王命之实,美其能将命尽职;五章举时人之言发明首章之意,美其有刚柔兼济之德;六章复举时人之言发明首章之意,美其能自举其德而又能补王之阙;七章写仲山甫奉命城彼东方前在国门外出祖(輶祭路神)仪式之盛大,美其有人情之乐;卒章写冀望其徂齐而早归之意,述作诗以慰其心之旨。其中,卒章曰:“四牡騤騤,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此“吉甫作诵”,即自述其名;“穆如清风”,即自评其诗——诗意深远和穆,如清微之风,可化养万物;“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即述其创作旨趣。

宣王静即位之后,推行一系列中兴王室的举措:元年(前827),复田赋,作戎车;二年(前826),赐太师尹氏皇父、司马程伯休父命;三年(前825),命秦仲西伐犬戎;四年(前824),命蹇父如韩,韩侯来朝;五年(前823),命尹吉甫北伐玁狁至于太原(在今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一带),又命卿士方叔南伐荆蛮;六年(前822),命太保召伯虎(召虎、召伯、穆公)南伐淮夷,又命皇父、休父从王南伐徐戎;七年(前821),王赐元舅申伯命,将其自西申陟封于南申谢邑,又命樊侯仲山甫城齐^②。特别是让姜姓申伯扼守荆徐之冲,使其与“汉阳诸姬”一起疆理江汉之间、安攘南国之域;又命仲山甫经营东土,以为东方屏障,都是宣王“蕃屏周”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举措。

故尹吉甫作《崧高》“以赠申伯”,作《烝民》“以慰其(仲山甫)心”,冀望他们能听诗人郑重叮嘱之辞,以见天子殷勤眷注之意,而承天子赐命恩宠之隆。足见此二诗皆在卒章画龙点睛,是传世中国古代诗歌中最早在卒章采用“自述其名”方式“显志”的叙事结构模式,也是“后世钱行赋诗之首唱矣”(清钱澄之《田间诗学》卷十)^③。尤其是诗中不仅洋溢着对宣王、召伯、申伯、仲山甫的颂美之意,而且对自己的诗作亦大加褒奖。正是诗人如此充满自豪的情怀,彰显出诗歌叙事主体浓郁的自我意识。故宋李樗、黄樵《毛诗集解》评之曰:“古今之作诗,未尝自著其名也;自言其名者或有之,未尝自夸其美也。……夫(《崧高》、《烝民》)自著其名,自夸其美,吉甫果何为哉?……天下之事,言者无愧则公言之,受者无愧则安受之。”^④清吴大受《诗筏》亦评之曰:“《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烝(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是美人者不讳其名也。”^⑤

①关于《诗·大雅·崧高》、《烝民》二诗之作者与主旨,说详:赵逵夫《中兴之业慷慨之音——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华文史论丛》1996年总第55辑。

②事见:《后汉书·西羌传》李《注》引《竹书纪年》、《诗·小雅·采芣》毛《序》、《大雅·崧高》毛《序》、《江汉》毛《序》、《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

③[清]钱澄之:《田间诗学》,朱清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818页。

④[宋]李樗、黄樵:《毛诗集解》,扬州:江苏广陵书社,1996年影印,第312页。

⑤[清]吴大受:《诗筏》,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1922)嘉业堂刻本,第40页。

二、《巷伯》卒章以“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方式“显志”的叙事模式

《巷伯》为周幽王时期(前781—前771)王室巷伯寺人孟子伤于谗以刺幽王之作(毛《序》)。全诗凡七章,首章以“兴”体与“赋”体结合,写谗人罗织他人罪状之伎俩,言谗人织成己罪,责谗人之太坏;次章以“比”体与“赋”体结合,写人众多而无人乐意与之谋,言其所谗无实,责谗人之可恶;三章、四章以“赋”体写谗人情状,诲谗人之醒悟;五章以“赋”体写谗人与被谗者异态,怨而诉之天;六章以“赋”体写谗人可悲之结局,深恶而痛击之;卒章以“兴”体言作诗之旨,警戒君子谗将及之。其中,卒章曰:“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此“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即自述其名,自称其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即自述其创作动机。

周王室卿大夫后来总结西周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诗·大雅·瞻卬》)、“谗言罔极,交乱四国”、“谗人罔极,构我二人”(《小雅·青蝇》),终致“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正月》)。足见幽王听信谗言,废后黜嫡,伤贤害忠,亡身丧国。故西周覆亡,女祸谗言为导火线,嫡庶之争为催化剂,西申侯则为掘墓人。

孟子作为“寺人”,自然亲近宫掖,目击褒姒之谗、申后之废与太子之黜,对谗人导致王室内乱的情况了然于心。故其作《巷伯》让“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不仅吐露自己被谗的哀怨之情,而且自小及大,推本求源,反复根究,归咎于王,将笔触由刺谗人伤己而及刺幽王信谗。尤其是如此怨刺之作,诗人却敢公然自出其名,无所规避,肆无忌惮。这与尹吉甫诗作洋溢着颂美之意相比,其所彰显出来的叙事主体自我意识更加强烈。故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七评之曰:“诗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①清吴大受《诗筏》亦评之曰:“《巷伯》之卒章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节南山》之卒章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讟。’是刺人者不讳其名也。”^②

当然,本诗与上述《崧高》、《烝民》二诗,尽管都是在卒章采用“自述其名”方式来“显志”这一叙事结构模式,但不论是叙事内容,还是叙事主旨,都截然不同。究其原因,除了作者(叙述者)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相异之外,社会地位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周礼·天官冢宰·寺人》:“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宦官》:“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于《艺文》。”^③则“巷伯”虽属掌王室宫事之寺人,然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与文学修养,故孟子才能作诗以刺王。但他毕竟为上士阶层的内小臣奄(被阉割去势之臣),出身微贱,地位低下,故其创作的叙事诗自然为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上的记事,属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而《崧高》、《烝民》作者尹吉甫为宣王卿士,属王室重臣,具有十分强势的话语权,故其创作的叙事诗自然为题材重大而风格宏伟的记事,属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可见,由于叙事主体的社会地位不同,不仅有叙事内容的“宏大”与“私人”之别,而且有叙事主旨的“怨刺”与“颂美”之异。

三、《节南山》卒章以“家父作诵”方式“显志”的叙事模式

《节南山》为周平王元年(前770)王室大夫家父(家伯父)刺幽王以戒平王之作^④。全诗凡十章,

①[宋]欧阳修:《诗本义》,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

②[清]吴大受:《诗筏》,民国十一年(1922)嘉业堂刻本。

③[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344页。

④说详:邵炳军《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论》,《文献》1999年第2期。

首章采用正兴反衬之法,写尹氏不仁,国秉在握却不亲视国政,终致民望尽失而“国既卒斩”;次章采用反兴正衬之法,写尹氏为政不平,终致“天方荐瘥,丧乱弘多”,天人交怨;三章写尹氏身居高官显位,责任重大,却使众民困穷;四章写尹氏不亲身理政,而委政姻亚;五章写天降穷极之乱、乖戾之变,正是尹师不临国事,为政不平,委政姻亚的必然结果;六章写至今仍“乱靡有定”、“俾民不宁”,使诗人“忧心如醒”;七章写诗人身历丧乱之祸,驾车避难在外,然四方昏乱,贤者不遇,无处远遁,前途渺茫;八章写诗人在颠沛流离之中,将西周之亡,离乱之苦,归咎于统治者内部矛盾所致;九章写上天降此灾祸,使“我王不宁”是因为幽王不但不惩改邪心,反而拒谏,远贤臣而近小人;卒章斥幽王之“讦”在于任用尹氏,亡国祸民。其中,卒章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讦。式讹尔心,以畜万邦。”此“家父作诵”,即自述其名;“以究王讦”,即自述其刺幽王之主旨;“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即自述其戒平王之动机。

幽王九年(前773),废太子宜臼(平王)被西申侯、鲁孝侯(公)、许文公(男)等拥立为“天王”;十一年(前771)骊山之难、宗周覆亡后,幽王卿士虢公翰拥立王子余臣为“携王”;平王十一年(前760),“携王”为晋文侯所弑之后,平王方成一统^①。在天王宜臼(平王)与携王余臣“二王并立”时期,诸侯国中除西申、鲁、许等直接拥立平王者之外,秦、晋、郑、卫等大国亦相继支持平王;甚至西都王室的一些贵族亦支持平王:“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具备,王赖之”(襄十年《左传》载周灵王卿士伯舆属大夫瑕禽语)。诸侯国君与王室贵族之所以要支持平王,就是希望他能够像自己的祖父宣王一样再次中兴王室。

所以,家父创作《节南山》“以究王讦”的动机,就是要刺古以鉴今。故全诗前三章直陈时弊,揭露尹氏的黑暗政治;中三章说明事理,指出其缘由;末四章以感叹抒愤懑之情。而作品在陈弊、说理、感叹之中,既有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又贯注了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一叹三咏,感寤具存”(明陆时雍《诗镜·总论》)^②,达到了“以意胜”的艺术境界。尤其是全诗前九章皆刺尹氏,卒章笔锋突转“以究王讦”,把尹氏与幽王巧妙地勾连起来,将批判笔锋直指周王。至此,诗人国破家亡之孤独,无处远遁之忧虑,匡时补天之清醒,三位一体;“闵时病俗之所为”,“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集于一身(宋朱熹《诗集传序》)^③。故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二十评之曰:“此章篇终矣,故穷其乱本而归之王心焉。致乱者虽尹氏,而用尹氏者则王心之弊也!”^④

尤其是诗人不仅在卒章采用“自述其名”方式“显志”的叙事结构模式,而且谋篇布局采用以铺陈手法张本而示末之法,这表明真实作者开始有意强调与叙述者之间身份的同一性,公开宣称故事的叙述者就是真实作者本人。在这里,真实作者、暗含作者与叙述者三种不同层面的叙事主体高度统一,叙述者之“我”、暗含作者之“我”与真实作者之“我”融和为一,他们在叙事进程中同步发声,体现出叙事主体高度的历史自信与鲜明的道德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节南山》与《崧高》、《烝民》、《巷伯》相比,堪称为将“自述其名”与“卒章显志”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父的《节南山》与孟子的《巷伯》皆为采用“自述其名”署名方式的怨刺诗,皆明白地表露出叙事主体的叙事意图,但孟子的创作动机仅仅是让“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其刺幽王之旨自然表现得比较委婉含蓄;而家父的创作动机则是“以究王讦”,其刺幽王之旨自然表现得更加直白外露。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作者的族群身份与族群意识,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都对主体意识的建构和表达有着重要影响。家父属周王室同姓世族作家群体,

①说详:邵炳军《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②[明]陆时雍:《诗镜》,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

③[宋]朱熹:《诗集传》,夏祖尧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页。

④[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9页。

其家族命运自然与王室命祚是息息相关的。二是家父历仕幽、平二王为宰夫,其职掌为“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周礼·天官冢宰·宰夫》),足见讽谏周王之失乃其职责所在。三是在骊山戏水之难而幽王身首异处之后,家父面对“二王并立”特殊政治格局,自然会愤世嫉俗而怨天尤王,自然会秉笔直刺而敢谏诤言,必然会表现出比前代诗人更为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

所以,家父的《节南山》与同一时期周大夫所作的《四月》,虽然在叙事模式上皆采用了“卒章显志”的结构模式,皆明白地表露出叙事主体的叙事意图,但《节南山》卒章“家父作诵,以究王讟”之言,与《四月》卒章曰“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之言相比,后者惟诉己哀伤骊山之难之情,前者则将批判锋芒直指周王,思想显得更为深刻,叙事主体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

四、《閟宫》卒章以“奚斯所作”方式“显志”的叙事模式

《閟宫》为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鲁大夫公子鱼(奚斯)颂僖公申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之作^①。全诗凡九章,皆采用“赋”体笔法进行叙事:首章推本姬周族群出于姜嫄与后稷,借以铺张始祖之所自始;次章追叙周族兴起于后稷第十三代孙太王(古公亶父),文王昌、武王发继世而成业有周,鲁公伯禽承周公旦庇荫而封土建国,借以铺张先祖之所由封;三章追叙伯禽受封,写僖公申以天子礼乐举行郊天、祀祖、祭社典礼之盛大;四章写僖公申以天子礼乐举行时祭、禘祭典礼之隆重,祝其昌大;五章写僖公申征伐山戎、北狄、荆楚、群舒时兵力之强盛,有攘夷之功,祝其福寿;六章写鲁境地域广大,颂僖公申使鲁国强大之功;七章写鲁土幅员辽阔,颂僖公申保有鲁国土地之功;八章写鲁复居常邑(鲁南境)与许田(鲁西境周公旦庙地址),颂僖公申能复周公之宇而家齐国治,美其有燕喜之福;卒章写修建路寝(正室)、新庙(闵公庙)过程,颂僖公有新作寝庙之德,以自述作颂结束。其中,卒章曰:“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栢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此“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栢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即点明颂僖公申乃缘作“新庙”而起之旨,与“閟宫”(姜嫄庙)首尾呼应,足见颂先祖实为颂时君作铺垫而已;“奚斯所作”,即自述其名;“孔曼且硕,万民是若”,即自评其诗——篇幅长而意义大,以顺万民之望。

僖公四年(前656),鲁从齐侯会宋、陈、卫、郑、许、曹侵蔡伐楚,逼迫楚作城下之盟,真可谓“中夏攘楚第一举”(清魏源《诗古微·鲁颂韩诗发微》)^②。正是僖公使鲁境“保有帛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鲁师“公车千乘”、“公徒三万”,终致“戎狄是膺,荆舒是怨”、“淮夷来同”、“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可见,其复疆土、兴祖业、建新庙,无疑是一位可以与伯禽比肩的贤能之君与中兴之君。故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评之曰:“僖公自是中材以上之人,过恶诚有之,要不失为贤君也。……若夫败邾于偃,败莒于郚,御侮之勇也;取须句,反其君,存亡之义也;纳玉于王,求释卫侯,亲亲之仁也。僖之美亦稍见《春秋》经、传,不仅《颂》有之矣。”^③

在西周初期确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政治架构中,王室(公室)大宗与王族(公族)小宗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根本与枝叶的互为依存关系。故公子鱼作为公族,自然希望公室更加

^①说详:邵炳军《〈诗·鲁颂·閟宫〉之作者、诗旨、作时补证》,《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27—153页。

^②[清]魏源:《诗古微》,何慎怡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400页。

^③[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清经解本,第781页。

强盛。同时,公子鱼又仕为僖公大夫,既是中兴之业的参与者,又是中兴之业的见证者,自然会成为中兴之业的歌颂者。当然,《閟宫》不仅仅是在祝颂与祭祀对象、修辞手法、祝颂言辞诸方面继承了《商颂·长发》、《殷武》、《周颂·雝》之传统,更有所创新与突破:称颂对象由以神(祖先)为主向以人(时君)为主之转变,汲取“风”、“雅”二体祷颂以诫勉之旨,篇幅宏壮而结构缜密,采用夸饰褒美手法,运用“隔韵”格式增强音乐节奏感。正是僖公中兴之业,开拓了诗人的创作视觉,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催生出长篇“变颂”《閟宫》。故《文选》卷十一载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评之曰:“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而在这些叙事内容与方式的演变进程中,所透露出来的内在动力,正是叙事主体自我意识的强化,反映出诗人的政治观念开始由神意政治与天意政治向人意政治的巨大转变。

五、“自述其名”方式与“卒章显志”模式在后世的变迁

1. 韵文卒章以“自述其名”方式来“显志”模式的变迁

“雅”诗自《节南山》以后,诗歌作者“自述其名”行文方式消失了,但“卒章显志”的叙事模式却依然存在。

比如,《小雅·何人斯》为桓王八年(前712)苏国之君苏成公(苏信公)绝友以刺王卿士暴公之作,全诗八章皆以“赋”体展开叙事:首章本欲指斥暴公,却从斥其从者以见意,颇有“打狗欺主”之味;二章言已被谗之事;三、四章刺小人反复,始亲终疏,谗言伤友;五、六两章责其从朝廷还时,亦过门不入;七章言苏、暴二公昔日政治上为同僚,艺术上为同志,可谓兄弟般之知交,如今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要出三牲来诅咒;卒章叙作诗缘由。其中,卒章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以峻辞责其人面而兽心,行为无常,不复含隐;所谓“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言作诗以深究反复无常者。足见前四章指出“何人”其心孔艰,谁为此祸?不入我门,不入唁我,不见其身,其为飘风,行踪诡秘,怪其不来见。诗人正是以化事为情、化实为虚之法,跳脱具体事实而着重抒发受害者疑惧不安、情绪郁怒之内心深层情绪,以突出抒情份量。然后再卒章结句直斥暴公谮己之不善,表示与同僚绝交之旨。

可见,此诗虽然在卒章没有以“自述其名”方式亮明作者身份,只是以12个第一人称代词“我”指代叙述者,但依然采用了“卒章显志”的叙事模式。故明孙矿《批评诗经》卷二评之曰:“此(七)章及下章,亦可谓峻诋,然却用损、簪语起,此正是极恨处。”^①当然,此诗为绝友以刺同僚之作,故卒章话语显得比《节南山》委婉含蓄得多。

在后世诗人创作的叙事诗中,将全篇的“诗眼文心”安排在篇末,实际上就是“卒章显志”的叙事结构模式。可见,由尹吉甫、孟子、家父、公子鱼等创立的诗人在卒章“自述其名”的方式尽管消失,但“卒章显志”的叙事模式却依然存在,并在结构模式方面显示出极强的艺术张力。

2. 散文篇末以“自述其名”方式来“显志”模式的出现

春秋以降有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是,作者在卒章“自述其名”的行文方式,尽管在韵文中消失了,但在散文中却出现了,并与篇末“显志”的叙事结构模式伴随而生,一直传承到现代。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此类在篇末以“自述其名”方式来“显志”的叙事模式,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托他人之名以述己志,像《左传》、《国语》、《晏子春秋》、《礼记》、《战国策》、《韩诗外传》、

^①[明]孙矿:《批评诗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末天益山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经150—第97页。

《新序》、《淮南子》、《史记》、《列女传》、《说苑》、《风俗通义》、《潜夫论》及后世碑文、谥议、论记、别传等文体中的“君子曰”之类,以及《旧唐书》纪传类篇末“史臣论曰”、《旧五代史》纪传类篇末“史臣曰”之类。

比如,在春秋战国之际成书的《左传》中,“君子曰”凡73见,“君子谓”凡14见,“仲尼曰”凡18见,“孔子曰”凡5见,“仲尼谓”凡1见,合计111例。其中:“君子曰”最早见于隐元年,“君子谓”最早见于隐十一年,“仲尼曰”最早见于僖二十八年,“孔子曰”最早见于宣二年,“仲尼谓”则见于昭十三年。其结构特点是:上文先叙事,然后或以“君子曰”、或以“君子谓”、或以“仲尼曰”、或以“孔子曰”、或以“仲尼谓”领起展开评论。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下距孔子生年(前551)凡81年,宣公二年(前607)下距孔子生年(前551)凡57年,昭公十三年(前529)孔子才23岁。则《左传》所谓“仲尼曰”、“孔子曰”、“仲尼谓”者,与《资治通鉴》篇末所谓“班固曰”、“陈寿评曰”、“欧阳修论曰”等的性质与作用完全相同,皆引述先哲时贤之言以申其旨。足见此所谓“仲尼曰”、“孔子曰”、“仲尼谓”者,皆为左丘明编撰《左传》所引后来鲁孔丘闻之所论之言以申其志;所谓“君子曰”、“君子谓”者,与“仲尼曰”、“孔子曰”、“仲尼谓”相类,皆为左丘明编撰《左传》所引当时鲁君子闻之所论之言以申己意。

足见叙事主体以不同形式在《左传》中频繁地现身于文本,在叙事之后回避第一人称“我”,而是借他人之言发表议论,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评价。当然,叙事主体以“君子曰”之类的形式以发其旨,虽有泛论,却不失其书之旨,显示出一种指导阅读的高昂姿态^①。可见,“君子曰”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介入叙述者”(intrusive narrator)代表之一,其深层影响表现在开创了“卒章显志”的叙事程式,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布下了一种思维定势:在讲述完故事后倘若不安排有形无形的“君子”出来议论一番,这种叙事似乎便不完整。故《左传杜林合注》卷一引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评之曰:“《左传》称‘君子曰’,多是采取当时君子之言,或断以己意。”^②

二是自述其名以陈己志,像《公羊传》篇末之“子公羊子曰”、《穀梁传》篇末之“穀梁子曰”、《史记》纪传类篇末之“太史公曰”、“司马迁曰”、《资治通鉴》篇末之“臣光曰”,等等。

比如,西汉初年成书的《史记》,出现“太史公曰”者凡142次,其中在纪传类篇末出现者凡128次;而“司马迁曰”仅1次:《秦始皇本纪》在叙述秦自始皇嬴政立国至其长孙公子婴亡国史实之后,其篇末以“贾谊、司马迁曰”领起展开评论,可视作是一种在篇末以“自述其名”方式来“显志”的叙事模式。而其他纪传类中皆回避第一人称“我”,每当上文叙事结束后,便在结尾处都以“太史公曰”的名义发表议论。即就是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亦回避第一人称“我”,而7次用其名“迁”来代替。

太史公是司马迁的职务名称,以职务名称代替“我”,从而将第一人称解构了。这种叙述者将第一人称解构为第三人称的方式,是史传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叙述传统。这种把个人泯灭于集体,在集体之中讲述个人,将确立个人价值的叙述手法反映在叙事文本中,便是叙述者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化。其意义在于,当摒弃第一人称而使用第三人称时,叙述者不再陷入个人,而是站在客观的立场进行叙述,此时不仅是作者,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支撑着文本,从而获得艺术的真实^③。故唐刘知几《史通·内篇·论赞》评之曰:“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

三是省略己名以陈其志,像《史记》纪传类篇末之“大论曰”,《汉书》、《后汉书》(范曄)、《晋书》(房乔)、《北齐书》纪传类篇末之“赞曰”,《东观汉记》、《后汉书》(谢承)篇末之“序曰”,《汉纪》、《后汉书》(华峤)、《后汉书》(司马彪)、《后汉记》(张璠)、《后汉书》(范曄)、《北齐书》、《北史》、《南

^①参见:傅修延《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②[明]王道焜、赵如源编:《左传杜林合注》,清光绪间仁和葛元煦刻甯图丛书本。

^③参见:王彬《解构的叙述者》,《理论探索》2010年第5期。

史》、《宋史》、《金史》、《辽史》、《清史稿》纪传类篇末之“论曰”，《后汉书》（谢承）纪传类篇末之“论曰”，《三国志》纪传类、《资治通鉴》篇末之“评曰”，《晋书》（王隐）、《晋书》（臧荣绪）纪传类篇末之“议曰”，《晋中兴书》之“述曰”，《华阳国志》篇末之“撰曰”，以及明清章回小说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之类的“说书人”，近代谴责小说中爱憎分明爱发议论的“叙述者”，等等。

比如，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出现“赞曰”者凡 122 次，其中在纪传类篇末出现者凡 119 次。其结构特点是：上文先叙事，然后以“赞曰”领起展开评论。此所谓“赞曰”，实际上是“班固赞曰”、“班孟坚赞曰”、“兰台令史赞曰”的省称，也是一种典型的“公开的叙述者”。其共同特点就是叙事主体显性评价与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故宋郑樵《通志总序》亦评之曰：“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刷论固也。”^①

可见，在西周后期至春秋中期创作的叙事诗中，无论是《崧高》、《烝民》、《閟宫》这类“美人者”，还是《巷伯》、《节南山》这类“刺人者”，叙述者都“不讳其名”而在卒章“自述其名”。这种诗歌作者“自述其名”行文方式尽管相异，但“卒章显志”叙事结构模式则同，他们都是中国诗歌叙事传统中介入叙述者的代表之一，彰显出叙事主体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之，在叙事文本中，真实作者替换了叙述者“我”，是一种最典型的公开的叙述者（overt narrator），其共同特点就是叙事主体显性评价与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当然，由于叙事主体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不同，他们在卒章采用“自述其名”方式“显志”的模式自然不尽相同，“显志”方式的隐显与内容的美刺自然相异，但其深层影响都表现在为诗歌叙事文本开创了“卒章显志”的叙事模式。

（责任编辑：陆 林）

Evolution of the Narrative Mode Characterized by Bringing out the Motive at the End of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ealing the Narrator's Name: Centering on *xiangbo*, *jienanshan*, *songgao*, *zhengmin*, and *bigong*

SHAO Bing-jun

Abstract: Narrators of *shijing* · *xiaoya* · *xiangbo* 诗 · 小雅 · 巷伯, *jienanshan* 节南山, *daya* · *songgao* 大雅 · 崧高, *zhengmin* 烝民, and *lusong* · *bigong* 鲁颂 · 閟宫 adopted a narrative mode characterized by revealing their names at the end of the texts to bring out their motives. In other words, they replaced the narrator “I” with the authorial “I”, referring to the real author himself. This is a typical case of overt narrator.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i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s overt evalu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Such a narrative mode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poetry and even literature in general.

Key words: poetry; true author; narrative text; revelation of the narrator's name; bringing out the motive at the end of the text; narrative mode

^① [宋]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3 页。